

水稻种植与乡村造景

——以人民公社时期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为例

丰 箫

(上海大学 社科学部, 上海 200444)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受到政权管理模式的重大影响。据人民公社时期联民村水稻种植的考察,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规划和安排。水稻种植各个环节以农民自身行动呈现,却也无不体现了国家和集体组织的力量。在生产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对产量的高度需求造就了密集劳动的场景。国家技术和权力推进能力的有限性、农民和乡村文化对于国家权力调适的有限性以及土地承载的有限性,既塑造了人民公社的成就,也衍生了许多不良后果,形成了特殊的乡村景观。

【关键词】水稻种植;造景;人民公社;联民村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4-0112-11

Rice Planting and Rural Landscaping

——A Case Study on Lianmin Village of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People's Commune Period

FENG Xiao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rural production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regim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rice planting in Lianmin Villag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People's Commune, the state had direct planning and arrangemen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social development. All links of rice planting reflect the strength of the state and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except peasants' effor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mmature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 high demand for output created a scene of intensive labor. The limitation of the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promote technology and power, the limited adaptation of the peasants and the rural culture to the state power, and the limited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land formed a special rural landscape, which not only shap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eople's commune, but also caused many bad consequences.

Key words: rice planting; landscaping; people's commune; Lianmin Village

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分析上,许多学者注意到现代国家强权的特征,衍生了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如萧凤霞的“行政细胞化”理论,孙立平的“强国家,弱社会”理论,吴毅的“全能型”控制观点,王铭铭的“社区国家化”理论,谢志焜的“国家社会”观点、张乐天的“冲击—反应模式”等等。近代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现代国家政权深入乡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学界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研究既有宏观分析与微观解剖,也有制度解读与社会生活的深描,以及多学科多方法运用,使得研究越来越

【收稿日期】2017-04-17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当代苏浙韶赣农村基层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12&ZD147)。

【作者简介】丰箫(1978—),女,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社科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农业史、教育史研究。

深入^①。但是在乡村详实而生动的社会生活中,国家与乡村社会是不是完全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仍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问题。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作物栽培和农民生产生活,表现出集体化时期的特征,也有其他时期的共性问题。本文以浙江省海宁县盐官镇联民村为例^②,对水稻种植及其农民生产和生活进行描述和分析,进而解析国家与乡村的关系。

一、水稻地位与景观描绘

在水稻种植早期,长江中下游先民采用“火耕水耨”的方式进行栽培,水稻因产量低也未成为主食。后来随着种植技术的提高、水利的修建和南方的开发,唐宋以后水稻渐渐成为南方主粮。在传统社会,人们获得的资源均来自于自然界,耕作方式也均是良性循环模式。如杭嘉湖地区把种稻、养蚕和养畜养鱼联系起来,形成“农—畜—桑—蚕—鱼”的综合经营方式及物能循环系统^③。这种模式是劳动力基于环境与自身力量的结果;其运作较少受到政府直接行政命令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乡村生产受到国家政权的重大影响。

海宁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其次为大麦、小麦、黄豆等。水稻种植的历史悠长,据考古发现水稻栽培历史距今至少已有六千年。1912年,海宁县水稻种植面积在17万亩左右;1936年,发展到19.8万亩;1947年以后,扩展到20多万亩^④。新中国之前,联民大队一直种植单季稻。1957年,政府号召农民们种植双季稻,政府的号召与农民增加粮食收入的愿望相吻合,联民大队开始试种。在经历了大人民公社时期的混乱以后,从1962年到1982年,联民大队年年种植双季稻。同一块水田,一年种两季水稻,季节紧,每一季水稻都要育秧。为了增加大田水稻的枝数提高亩产,早稻与晚稻秧田的落谷数量都较大,秧田的面积相应也较大。表1反映了联民大队早稻与晚稻秧田面积的情况。

每年初春,联民大队各生产队队务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确定全年实际种植计划,其中重中之重是千方百计增加水稻种植面积。“吃饭靠集体”,“生产队集体当家人”的第一责任是解决“一百多号人的吃饭问题”。为了增加粮食的产出,生产队一方面努力提高粮食亩产,另一方面“挖空心思”扩大水田面积。1970年代,陈家场几乎每个冬天都进行“地改田”,即把桑树地改建为水田,这项工作得到了陈家场农民的大力支持,但违反了国家种植计划。根据“老三定”的核定,陈家场以种桑养蚕为主,每年为国家贡献蚕茧,国家则每年为陈家场提供供应粮。原则上讲,桑园面积与粮食供应直接相关,是国家核定的种植计划面积,不能轻易变动。生产队长只得隐瞒“地改田”的情况,上报的桑园面积“都照抄上一年

① 关于人民公社研究的成果众多,可参考一些相关综述:张寿春:《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人民公社问题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刘德军:《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研究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2期;王玉贵:《近十年来人民公社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刘庆乐:《人民公社研究状况述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辛逸:《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湛风涛:《人民公社研究概述》,《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4期;钟昱:《人民公社问题研究述评》,《现代农业》2012年第11期;陈益元:《人民公社体制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张寿春:《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人民公社问题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郑清坡:《农村人民公社史料的搜集整理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4期。

② 文中部分资料表述参考《共生经济》一书。张乐天、丰箫、邱梦华:《共生经济(1969-1982)——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经营》(未刊稿)。

③ 游修龄:《中国古代对食物链的认识及其在农业上的应用》,《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④ 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内部文稿),2008年初稿,第200页。

的”。在相当长时间内,陈家场每年上报的桑园面积都是 93.177 亩,严格执行着国家的计划指标。直到上级放松了管制,阶级斗争的气氛渐渐淡了,陈家场才上报了真实的桑园面积。这是陈家场人年复一年违反国家种植计划“地改田”的结果,是革命时代生产队集体生存意识的实践。

表 1 1971 年度联民大队计划种植面积 (单位:亩)

	早稻秧田	早稻	双晚秧田	双晚
东 风	12	83	14	97
红 星	12	83	14	97
红 江	10	67	12	79
立 新	10	80	12	92
东方红	8	66	11	77
红 旗	7	58	10	68
向 阳	12	87	15	102
胜 利	9	82	12	94
合 计	80	606	100	706

资料来源:周生康,《工作笔记》,1971 年 3 月 20 日。

双季稻的种植,水稻新品种的引进提高了水稻的产量,也增加了农业劳动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浙北地区纬度偏北,一年种植三季作物“季节太紧”,在关键时期,农民们不得不起早贪黑,争分夺秒抢季节。7 月底 8 月初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恰恰又是最忙的时候,联民大队的农民们每年都要经历一次“双抢”^①的考验。双季稻带来的增产、分配时多分的结果让公社和农民都比较满意。如 1959 年海宁县委员会在《农工部关于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资料》中讲到:“今年春花预分,平均每户分到 72.5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0.6%。早稻预分平均每户分到 48.6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36%。90%以上的社员在春花和早稻分配中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收入,不仅改善了生活,而且到七月底还储蓄了 84.5 万元。”^②

这种结果让公社自信可以为老百姓描绘出美丽的前景,1959 年钱塘江公社十年规划中畅想 1969 年公社将出现这样一幅美景:“工厂林立遍农村,田野到处机器响。旱涝灾害根治光,生产发展火箭上。络麻胜过兴竹林,水稻产量破天荒。土地变成园田化,猪羊成群禽满场。环境改换园林化,路旁成荫百花香。社员住进新村屋,新房子里电灯亮。吃穿营养和绸纺,出门实现车船化。医院戏院普遍有,文教卫生普及化。幼儿进了幼儿园,老人住进敬老院。公社已成全民有,农业工人社员当。”^③在这个场景描绘中,现代工业及其设施被广泛引入农村,同时农村的田园场景也一并保存,可以说和那时农民对于未来的期望能够达成一致。

二、水稻种植与国家造景

因国家对粮食增产的要求,地方各级单位也积极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1959 年海宁县人民委员会述及爱国增产问题,有一套非常详细的工作方法:“首先有重点的搞,先在周镇开始,以后各区找重点,加强宣传动员,订出增产计划,创造条件,在组内必须开家庭会议和互助组员会议,还要吸收其他组员代表来参加,共同研究计划。这样局部开展,推广全面。本县经过发动以后,计有二十八个互助组

① “双抢”指抢收早稻,抢种晚稻。

② 《关于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材料》,浙江省海宁市档案馆,档案号 16-1-195。

③ 《一九五九年本社十年远景规划(海宁县钱塘江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海宁市档案馆藏,58-1-43。

向全省应战,向全县挑战。”^①

在当时的农业条件下,要想实现增产计划,需要在种植各个环节下功夫。比如耕地实行深耕多耕,育苗采用合式秧田,以提种秧苗和成苗比率。这些耕作要求,海宁县人民委员会是有一些具体规定的,并对实际操作有些评判和要求:“全县的土地已普遍的已垦(耕)过二次,在互助组及生产户都耕过三次到四次,大部分做到深耕八寸和八寸以上,符合要求。在络麻方面,一般的已开始播种。群众今年对提高下种信心很强,对合式秧田问题,早稻地区如硖石袁花,已经积极的在合式秧田,群众从去年已提高一步,对此很有信心。在晚稻地区还没有开始,鼓励群众做合式秧田。但是部分落后地区如袁花的闸口乡群众不够重视,但是,劳动力缺乏及军属没有互助组建立的地区,在春耕边存在着个别户没有很好的春耕。”^②部分生产队秧田面积预先留备不足的可以搞二段育秧,主要是为了避免忙于收割早稻而使晚稻超过秧龄期。这一举措被视之为伟大的发明创造:“二段育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创造,是育秧技术的革新,是一项新生事物。”^③

1973-1974年,斜桥公社、许村公社永福大队、双山公社利民大队试种晚稻二段育秧535亩,应用在迟插田里,增产效果显著。海宁县水稻育秧转向“中苗带土、水育大秧、二段育秧”三秧配套。生产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些调整,早、中批采用中苗带土,头、迟批采用水育大苗。如“广六矮四号”采用大苗而高产,“先锋1号”中苗带土能高产。1970年代后期,海宁县常晚稻推广“一扩两降”^④技术。在实际操作中,联民生产大队告知各生产队避免历年的“四气”现象:秧田面积小气、播种量阔气、管理客气、收割大气^⑤。1974年,海宁县委指示晚稻以水育大苗为主,1979年,全县春花田早稻基本实行水育大秧,平均秧田播种量每亩70公斤,大田每亩用种量为13公斤。绿肥田早稻尼龙薄膜育秧,秧田播种量每亩122公斤。晚稻水育大秧面积占80%以上,每亩播种量为60~90公斤,大田用种量12.5公斤^⑥。

为了提高产量,插秧密度也一直在提高。插秧前先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到田的两头约距离田边1公尺处“打秧桩”^⑦,农民们以两颗秧桩为准,拉直秧田绳。两条秧田绳之间划出了一个人插秧的空间,农民双脚站在居中位置,双脚的左面、右面、中间各插2丛秧,横向一共插6丛秧,纵向则从田的这一头一直插到田的那一头。秧桩规定了两根秧绳之间的宽度,各个不同时期,因为上级的布置不同,宽度也各不相同。在人民公社时期,总的趋向是插秧密度的增加,例如,原先秧丛之间的距离是5寸×6寸,秧绳之间的距离为3尺。但这种过度密植显然是违背现实的,因而后来出现了调整,“合理密植”,秧丛之间的距离变成3寸×4寸,秧绳之间的距离就缩小到1尺8寸。

传统农民只种植一季春花、一季水稻,作物生长时间宽松。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各个生产队都先后把每年两熟制改成三熟制,即一季春花与两季水稻。在国家计划经济的严格控制下,生产队集体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增加粮食产出的冲动。任何一种耕作技术,只要能增加粮食产出,就是好的技术。换句话说,生产队在引进耕作技术的时候,较少关注节约劳动力的问题。张乐天教授将这种情况称为“过密型技术偏好。”^⑧这种特征被赋予了新社会、新技术标签,在自上而下的会议和要求中,层层强化。

水稻种植中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防虫治虫,其治理效果直接关系到产量的高低,生产队非

①《海宁县关于农业生产月度工作,春耕生产、治虫工作的意见汇报、总结》,浙江省海宁市档案馆藏,3-1-191。

②《海宁县关于农业生产月度工作,春耕生产、治虫工作的意见汇报、总结》,浙江省海宁市档案馆藏,3-1-191。

③周生康:《工作笔记》,1974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④一扩两降即扩大秧田面积,降低秧田播种量和大田用种量。

⑤这句话的意思是秧田面积太小,秧田落谷量太大,水稻生产管理比较放松,水稻收割马虎,导致浪费。

⑥海宁市农业局编:《海宁农业志》(内部稿),2008年,第32-33页。

⑦秧桩指根据规定的插秧密度先插下几颗秧,以便大家以这几颗秧为标志放置秧绳,进行插秧。

⑧张乐天著:《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5-239页。

常重视治虫工作。1968年8月9日,联民大队召开生产队正副队长会议,治虫人员也参加,主要议题是当前生产问题和治虫问题。对于除虫,会议决议:“除虫问题,时间(11-12号)。但是施新农药一定要重视。……当前除虫要引起重视。今年施用农药是甲季1605,是相当好效果,死虫效率较高,对蚂蟥钉螺杀死比较高。不误农时,打一场歼灭战。为了把这场除虫工作胜利进行,首先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武装头脑。防止麻痹轻敌,思想大意粗心,反说别人多管,不相信。如果有这样思想,后果不良,可能发生事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深入群众,教育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教育好群众,备足吃水壹星期,最少备足5天,同时教育子女不要下水,特别是5到6岁的小孩,最容易中毒。施田面积凡是4号前的稻都要施上,时间(11-12)多除^①。这次是甲季1605,每亩2两,单季稻3两,新样。施药工具严格掌握,不要随便河内淘洗。”^②新农药甲季1605是从德国进口的剧毒农药,当时第一次使用。由于对于人、畜的危害都很大,所以各级都十分重视。因此施药期间特别关照农民注意安全,对于用药工具的处置也有特别交待。

新中国成立以后,供销社统一经营的农药种类和数量渐次增加。一些对人畜药害大、残留性高、低效的农药,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步退出供应和使用,一些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逐渐投入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1956年,为了有效防治单季晚稻二代三化螟,海宁示范推广苏化203、乙基1605、甲基1605,效果明显,很快在全县推广使用。到1967年,有机磷农药全面取代有机氯农药。但是,乙基1605、苏化203等农药有剧毒,可能严重危害人畜安全,海宁努力用新的替代农药。1971年推广有机磷与有机氯混合制剂甲、乙氯杀螟粉,1972年推广高效低毒有机磷制剂马拉松、杀螟松。1980年开始,海宁再次推广高效剧毒有机磷农药甲胺磷、氧化乐果。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末,海宁主要用稻脚青防治水稻纹枯病,用退菌特防治水稻白叶枯病。由于前者残毒对环境污染大,1980年代初已停止使用^③。

在人民公社时期,各种农药的引进为公社增产带来了希望,因而农业技术员、植保员或除虫员得到公社的高度重视。人民公社建立了农业科学技术站,组织了覆盖每一个生产队的农业植物保护员^④队伍。公社通过有线广播向全体农民们发布有关病虫害的消息,通知他们在什么时间应该使用什么农药,具体讲述农药的使用方法。公社、大队通过一次次会议布置除虫灭害工作,这成为当时农村的新景观。

三、拔秧、插秧与劳动记忆

在人民公社时期,水稻种植是一种集体性生产活动,主要表现在水稻移植时拔秧、插秧,以及收早稻种晚稻的双抢。

拔秧是“扎堆的活”,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一起做。每个人拿一只双面平板的小凳子,叫秧凳^⑤。秧凳放在秧板上,农民们坐在秧凳上用双手和着水拔起秧苗。拔秧算比较轻松的活,但是,活再轻松,以同样的姿势干几个小时,总是对人的身体的考验。拔秧需要“手上功夫”,包括手势的掌握、手指的力量。手上功夫不够,拔秧就会出现两大问题。或者连根带起的泥土太多,洗根十分困难;或者拔断秧根。

① 在11号、12号都做好除虫,施好1605。

② 周生康:《工作笔记》,1968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③ 海宁市供销社志编写组:《海宁市供销社志》(内部稿),第163-164页。

④ 植保员也叫除虫员。

⑤ 因为泥土松软,四只脚的小凳子会陷进泥里,所以联民大队一带的秧凳都是双面夹板,夹板面积大,不容易陷进泥里。

前者只不过影响拔秧的速度,后者却“拔死了秧”,拔秧时看不到,插秧时见分晓,会“被人骂的。”^①

拔秧一般是早工,起早拔秧之后再吃早饭。拔秧时将整一板都拔光的,以便再开垦种地。拔一把,扎一扎,根要扔在水里。秧田与大田距离不等,近的相隔不远,远的甚至有一里路,要由男劳力挑到大田里。拔起的秧不能隔夜,只要拔起就要尽快种植。拔秧基本是女性,很多女性在一起,大家常常聊天、唱歌、讲故事、讲电影、讲戏文,拔秧时田地里非但不闷还非常热闹。各种家长里短的故事也在田地里飞跃,许多打骂也因开玩笑捏造的事情而起。“祝彩英人长得漂亮,阿五故意骂彩英,说她妈妈么是老鸨、野鸡,讨了窑子里。彩英的妹子,下子火的来,走过去摁住阿五,彩英再去帮忙,两个人把他摁在烂泥里,摁在了田里。”^②

拔起的秧苗必须当天插完,因此,拔秧的时间与数量是计算好的。最紧张的在“双抢”期间,生产队常常凌晨三点左右就吹起哨子,叫大家起来拔秧,一则为了抢时间,二则凌晨拔秧气温较凉一些,对秧苗的伤害小。到吃早饭的时候,全队的拔秧任务就完成了。生产队里男劳力充裕的话,挑秧的活都由男劳力包下。但是陈家场男劳力少,青年妇女也要挑秧。农民们通常用土箕挑秧。土箕装秧,秧根并在一起,秧的叶子朝外,叶子不会碰伤。技术好的农民可以“装秧装到半人高”。秧挑到大田里以后,沿着大田的边上分散堆放,以便均匀地“丢”到田里,准备插秧了。

插秧是“大兵团作战”,在“双抢”时节,到了下午三点钟以后,太阳渐渐偏西,阳光不再“毒辣”,队长就安排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一起下田插秧。插秧的场面十分热闹,笑话、死话、脏话、讽刺话、挖苦话、下流话满田里飞,不时地闹出一些争吵来,大多是“闹着玩”。秧绳拉好后,一扎扎秧也被分散地“丢”到秧田绳之间,一场自然的插秧竞赛马上就开始了。农民们都从大田的某一头下去,一边插秧,一边向后退去。同时可能有十多个农民一起下田插秧,手脚快的农民手到水起^③,一丛丛秧很快竖立在田里了。手脚慢的农民被慢慢地抛在“前面”。不久,农民一个个把自己负责的一排秧插完就“上岸”了,把少数几个农民“关”在田里。麻烦的是,手脚快的农民可能把田里的秧拿走了,被“关”的农民缺少秧,不得不大声喊叫:“快给我送扎秧来,快给我送扎秧来。”插秧时,两脚分开在垅两侧,双腿弯曲,弯腰俯下,一边插一边向后退,着力点全在腰上。腰部的劳累可想而知,农民对我说:“粮食是我们乡下人叩头叩出来的呀。”^④

插秧后也要检查数量和质量,以便记工分。据嘉善的沈林弟回忆,有两年暑假他都回家做记工员。下午三时开始,他最忙了。女社员们排成一行开始种田,他先要用四米竹竿(社员们都叫它“丈杆”,上面划好尺寸)量好长度,女社员们种一行,他就按照长度给她们记分。她们每一行种好一半左右,他就用1.5米的“丈杆”,量种的棵数,标准是一“丈杆”15棵,也就是每棵距离10厘米,如果一“丈杆”13棵或者以下,那么就要扣分了。一天,他量到一位女社员种了12棵,报告了生产队长,队长扣了她3分工分。收工的时候,这名女社员哭了,晚上吃饭他把此事告诉了父母,母亲说:“我们挣个工分不容易,种田的时候腰都要断了,你以后……”母亲话没有说完,父亲干咳了一声,打断了母亲的话,并冲他笑了笑。此后出现这种情况,他也不再向队长汇报。^⑤

如上所述的质量检查,也因“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情面而形同虚设。许多学者在论及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劳动时,往往会以劳动效率低、劳动质量差来批评其时的劳动管理制度。如有学者指出,农民的

① 拔秧的时候,断了根的秧有时也与好秧扎在一起,但是,这“扎”秧苗拿到大田里去插,断了根的秧马上会浮起来,十分引人注目。插秧的农民就会追问这“扎”秧是谁拔的,会骂人。

② YYZF-201003,育秧专访-2,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③ 插秧时,大田里都放着浅浅的水,农民的手指夹着几颗秧,插下去的时候,会溅起小小的水花。

④ 沈友群:《烈日炎炎忆“双抢”》,《南湖晚报》2016年7月4日。

⑤ 沈林弟:《双抢》,《嘉兴故事》,http://www.jiaxing.cc/Article/jiahefengwu/2012/0R1B22012662.html。

生存理性和村庄传统对于农民的生计观念和谋生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革命的现代性逻辑遭遇到农民日常生活逻辑的抵抗,使看似无可辩驳、无法更改的人民公社体制机体受到村民虽然微弱但却是日积月累的侵蚀^①。同时,许多学者也都指出,大多数地区的农民耕作的质量也要得到基本的保证,既是同样基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个人面子,也是缘于农民作为农业的专业生产者的基本素质。热闹的劳动场景、家长里短的议论、个人劳动质量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之议与人民公社制度的农业管理制度,自然地融为一体,共同成为农民和下乡知青的深刻劳动记忆。

四、“双抢”与集体劳动

早稻的成熟和收获一般在7月下旬至8月初。早熟品种如连塘早、嘉兴白皮等在7月20日左右可以收割,但产量不高而且易倒伏。一般的中熟品种都要在7月底和8月初,甚至要到8月上旬的中期。晚稻播种期一般在6月16—18日,播种过晚则会影响晚稻的生育期。秧田里的秧龄期一般是35天,播得稀的可推迟到40天,但最长不得超过45天。超过秧龄期秧苗就会拔节上升,将这种秧苗移栽到大田里,就不会分蘖和发棵,严重影响晚稻产量。人民公社时期,曾为了不使超秧龄推迟到6月23—25日播谷,同时又把每亩秧田播种量100斤减少至80斤,可适当推迟秧龄期和移栽期,如果6月23日播种,秧龄期45天,可到8月8日移栽,刚巧立秋,没有超过这个关口。如果面积多,在这一天当中是不能完成双抢的,只有提前几天才能完成,即从8月5日左右就一定要开始移栽。所以每个生产队如果早稻中熟品种多,双抢的压力很大,很可能出现超秧龄或者超过立秋关^②。

鉴于任务紧张,为了赶晚稻的季节,许多生产队往往提前收割早稻。上级政府再三强调不要割青^③,而生产队里往往等得心焦,采取割青,以防延误了晚稻产量,贪小失大。如果某生产队在8月2—3日开始双抢,一定要超过晚稻插种季节——立秋关。早稻收割、晚稻插秧最为紧张,唯有“抢”,才不脱季节。于是有了“双抢”。

为了动员群众,各级党委、政府都把“双抢”当作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层层开誓师大会。誓师大会更多是仪式性的,为了落实“双抢”任务,大队和生产队还要召开许多工作会议。1971年7月11日,联民大队召开干部会议,针对双抢工作提出“思想上早发动,计划上早落实,物资上早准备,劳力上早组织”,克服那种认为“双抢年年搞”,都是老一套的麻痹大意思想,认真对待今年的双抢工作,力争不过“立秋”关^④。如马汉民在双抢誓师大会的发言指出,一切工作都要以“双抢”为中心:“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各行各业要大力支援‘双抢’战斗。搞好‘双抢’,不单是人民公社、农业部门的事,而是全党、全民的事,要全国动员,大办农业。各级领导要深入基层上第一线,发动和组织群众,投入战高温、抗干旱,搞双抢、夺丰收的战斗,帮助下面分析情况,总结经验,研究经验,研究措施,抓住重点,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在‘双抢’期间与此无关的一切会议都要停下来服从‘双抢’,在‘双抢’中必要开的会,也要提倡开短会,开现场会,切实改进工作方法。”^⑤

七八月正值夏日炎炎,天气热、季节紧,“双抢”显得特别紧张。按常规做法难以完成“双抢”任务。生产队一般采取分组的办法,把“双抢”的任务分配到二个组里。大伏天中午的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

① 马维强、邓宏琴:《生计与生存:集体化时代的村庄经济与农民日常生活——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考察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② 胡少祥:《胡少祥笔记》,1999年7月25日,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③ 割青,指在水稻未完全成熟时就收割。

④ 周生康:《工作笔记》,1976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⑤ 《马汉民同志在“双抢”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海宁市档案馆,1-5-396-1,第96页。

不但人难以忍受酷暑的高温,就是秋苗也会被烈日晒坏。因此,“双抢”的劳动日程常常是:凌晨两、三点出工收割早稻,约六点半吃早饭,饭后七点半到十点左右割稻、摊田或者施肥,然后下午4点左右开始插秧。随着太阳渐渐西下,蚊子开始“上市”,猖狂地向在田里弯着腰的插秧的人进攻。为了赶进度,有的时候夜里还点上太阳灯插秧。社员一天下来早已筋疲力尽,心里也想着早点回家。这时插出来的田质量总是不好^①。

各生产队进行划分临时操作组,队委会到班组带队,全队男女劳动力总动员,组织临时食堂,成立农忙托儿所,尽可能组织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双抢工作,通水、机耕由村组统一安排。劳力调配是各生产队双抢工作中的一个难点,因而干部要带头投入双抢。

双抢的任务是非常紧张而繁重的。上午收割早稻,下午插种晚稻,具体到一个田块要做到早见黄稻、晚见青苗。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收割后,要把谷子集中到生产队晒,场上有专门人员筛谷和晒谷;有时将鲜谷分到户由各户负责翻晒,往往在中午还要分柴草;早稻草捆扎成个,按个头分到户,各自拿去晾晒,清理田块,再放水耕田。如果两项有一项跟不上,就会影响这个组一天的双抢工作。所以双抢工作安排难度较大也难以达到一碗水端平,队与队、组与组、以及组员内部往往发生争执。

一个生产队分了几个临时操作组之后,生产进度当然快得多,有竞争性、有对比性,但往往是矛盾多、争执多。竞争劳力、争好做手、争水、争机、争好土地、争近远等等矛盾百出。竞争当然有利于抢季节,也是争面子、争荣誉、争工分。早完成一天双抢,可早一天争其他农活的工分,多做一天争10个工分,就多了8毛钱,所以当时生产队竞争相当激烈,往往在双抢季节的竞争中,这个班组凌晨两三点起来收割,那个班组插秧插到深夜12点或1点钟,一般中午避高温,但也有的组吃饭超过12点,也有的组吃中饭早一点,下午还要做一个小时才休息,12点吃饭的组,下午3点钟就出工。具体以一个生产队为例,基本上日夜不停地在进行交替双抢。只有下午2-3点最高温时才会休息一下。插秧时一般是男的挑秧,女的放种田绳,直到完成才休工,有时要劳动到天黑,甚至在月光下还要干。在天将黑的时候,还坚持插秧^②。

双抢工作、劳动强度特别大,又是高温作业。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农业生产完全靠人工操作,翻耕土地靠人工、插秧靠人工。虽有水稻脱粒机,但是人工脚踏机器脱粒,收稻时往往劳动长达12小时以上,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非常大。因此回想当年的“双抢”,很多人表示“真是拼命似的,没人后退,没人逃避,大多是超负荷地工作,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③!到20世纪70年代,农村才开始用电动打稻机脱粒和手扶拖拉机耕田,农民的劳动强度才降低,劳动时间也相应缩短^④。

五、环境、生产与景观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快速增长,并相继出现几次生育高峰。1949—1957年的8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各地人口出现大量下降。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9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⑤。从1949年开始,海宁县人口第一个10年中增长了87005人;第二个10年增长人口最多,达到

① 张乐天:《张乐天日记》,1998年3月8日,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② 胡少祥:《胡少祥笔记》,1999年7月25日,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③ 林 华:《难忘的“双抢”》,衢州新闻网,http://news.qz828.com/system/2016/07/28/011168743.shtml。

④ 胡少祥:《胡少祥笔记》,1999年7月25日,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⑤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史》,http://www.showchina.org/zgrk/jbqk/200701/t104935.htm。

111229 人,年均增长人口超过 1 万人;第三个 10 年中增长 55991 人,最后一个 10 年增长最少,只有 42559 人。1960 年代初期到 1970 年代初期,海宁几乎出现了一个“人口爆炸期”,而这个时候增长的人口更多地滞留在农村中^①。

表 2

联民大队 1961—1976 年度人口与耕地变动表

(单位:人、亩)

年度	人数	男	女	男劳力	女劳力	耕地总面积	水田面积	旱地面积	桑园面积
1961	1145	482	663						
1962	1241	570	671	223	249	1565.354	608.314	839.458	117.582
1963	1336	602	734	251	264	1887.863	608.314	855.849	423.700
1964	1365	631	674	280	295	1868.020	608.314		606.473
1965	1389	645	744			1868	608		606
1966	1403	654	749			1865	608	651	606
1967	1416	662	754			1863	608	649	606
1968	1441						608	641	606
1969	1485						608.565	?	606.473
1970	1517	702	815				608.134	595.519	606.473
1971	1522			363	415		608	606	606
1972	1530	722	808				608.136	604.439	606.473
1973	1559	743	816				608.1	602.5	606.5
1974	1576	755	821				608.134	580.058	606.471
1975	1590			364	416		608.134	583.498	606.473
1976	1605	773	832				608.134	575.988	606.473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文书档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说明:在联民大队会计档案、统计档案中,部分年份的报表中有关劳动力的设计分“总劳力与其中全劳力”两栏,相关的数字没法测算出男劳力与女劳力,表中只能空缺。

如表 2 所示,1961 年后联民大队的人口一直处于正增长状态,而水田和桑园在 1963 年后都没有变化。旱地却有明显的浮动,是不是水田和总耕地面积数据不准。当然,会计数字与实际会有偏差,但实际上,联民大队一带根本就没有增加土地潜力。新中国初期,各地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荒地,但很快这些荒地复耕。后来农田水利建设中填了一些河浜,增加了土地面积,但许多被用来做渠道、机耕路、建房等等,因此实际上最终联民大队的耕地面积只减不增。在人口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一直多于男性;在劳力上也是如此,这对于集体时代的农村而言并不是好事。女性在农业当中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也形成了历史新高峰,但是基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并不能因此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只有极个别女性因其出色的劳动获得比一般女性多一点的工分,或者政治职位。在很多地区,女性的农业贡献与其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劣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②。

① 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海宁市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 年,第 141 页。

② 胡玉坤:《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农作的女性化现象——基于对西部两个村落的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6 年第 3 期。

表 3

联民大队粮食面积产量年报表

年度	种植种类	面积	单位产量(市斤)	总产量(市担)
1962	早 稻	119.85	333.4	67062.5
	单季晚稻	176.5	447.4	79030.5
	速作晚稻	199.85	394.5	78928.0
	中 稻	56.8	328.8	18673.5
	水稻合计	553	440.7	243694.5
1963	早 稻	338	452.3	152888
	单季晚稻	150	470.4	70559
	连作晚稻	338	478.7	162318
	秧田晚稻	44	440.1	19366.5
	晚 稻	532	473.2	252243.5
	水稻合计	870	454.2	405131.5
1971	早 稻	586	529.3	310188
	中 晚 稻	690	404.8	279319
	水稻合计	1276	462	589507
1975	早 稻	585	531.4	310872
	中 晚 稻	704	442.03	311185
	水稻合计	1288	492.4	622057

资料来源:《联民大队文书档案》,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资料中心藏。

说明:1963 年晚稻统计包括单季晚稻、连作晚稻和秧田晚稻。

在联民大队的统计资料中,中稻的亩产量较低,种植面积也较小,后来或混在晚稻统计数据中,或基本没有。1962–1963 年单季晚稻种植面积尚较大,1964–1967 年分别仅有 9、19、22、22 亩。虽然单季晚稻的亩产量要明显高于早稻和晚稻的平均产量,但与连作晚稻相比却没有优势可言,如 1963 年数据显示。因而此后数年中稻和单季晚稻的耕作面积保持在 30 亩以下,水稻年产量基本为增长趋势,这是以粮食总产量为目标的理性选择。

黄宗智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新中国党政权力机构对农业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过单纯的提取剩余,而是进而囊括了经济管理权和分配权^①。费正清指出:中国内向爆炸的办法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土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种稻方法从来都是以劳力为主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以改变^②。雷蒙·威廉斯提出:许多提倡过农村生活和提倡保护自然资源的现代人将“国家”和“规划者”视为他们的主要敌人,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国家正在管理、规划者正在为之服务的是一种经济体质,它的主要目的、程序和标准都体现出它的资本主义本质^③。近代以来国家对于农村的建设或者管理实质上无不以经济为重要目的,因为有了国家政权的推进,才使得政治特征尤其明显。民国推进乡村建设时,为乡村建设服务的机构借助于行政机关而非借助于公司、群众团体等社会机构,乡村建设的成效就取决于行政机关的效率^④。

①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94 页。
② [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年,第 7–8 页。
③ [英]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乡村与城市》,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399 页。
④ 丰簃:《田祖有神:治虫与政治强制式的现代化——以浙江省为例》,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77 页。

基于人民公社提高粮食产量的迫切需求,在农业生产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和人民公社基层单位都迫不及待地推广技术,在技术不足时只得用行政的方式加强密集劳动,造成了人民公社时期特有的劳动场景。王保宁通过对 400 年间山东耕作制度的考察,认为农民在气候突变的情况下表现出环境——生存理性,在面对商业化的情况下则表现为市场——发展理性。1950 年代,国家意志覆盖了农民理性,并导致粮食减产和生态失衡^①。荀丽丽认为,雄心勃勃的现代国家谋求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控制,国家对“自然”的直接掌控诉诸的是一个以“生产主义”的“建设逻辑”为核心的“权力的资本与技术网络”^②。根据本文对水稻种植过程的细致分析,当人民公社将生产的空间完全聚焦于农业生产时,农业生产技术却未能达到全部承载人口的水平,同时国家和农民对于农业环境与生产的认识都未能达到高度期望的程度,在技术应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技术调整或者激流勇退的行为,同时也造成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果。因此,国家技术和权力推进能力的有限性、农民和乡村文化对于国家权力调适的有限性以及土地承载的有限性共同造就了人民公社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衍生了许多不良后果。有学者指出,如果环境问题只有借助于国家的措施和资源来解决,一般来讲前景渺茫;日常积极有效而又忠实的社会单元是家族和村社^③。当前单单依靠家族和村社亦不现实,如果将两者作用在各自应有的范围内有效发挥则是相当迫切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明了国家、农民和土地承载的有限性,对于乡村建设和乡村环境的认知和实践的推进才可以进入新的时期。

[参 考 文 献]

- [1] 张乐天.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 约阿希姆·拉德卡. 自然与权力[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 [3]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4] 胡玉坤. 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农作的女性化现象——基于对西部两个村落的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2016,(3).



(上接第 111 页)

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对南方地区的经略使云贵川、岭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天然林木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当时上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仍较为落后,且人口稀少,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林木采伐活动,故破坏程度有限。而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特点也适宜乔木植被的生长,林木有快速再生的可能。破坏小且恢复快的特点,使得南方地区的自然植被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较好的保存。

[参 考 文 献]

- [1] 耿德铭. 史籍中的哀牢国[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6).
- [2] 官德祥. 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竹木述要[J]. 农业考古,1996,(1).
- [3] 林鸿荣. 桫欂求索[J]. 古今农业,2004,(4).
- [4] 周宏伟. 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考察[J]. 中国农史,1994,(4).

① 王保宁:《气候、市场与国家:山东耕作制度变迁研究(1560-1960)》,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年。

② 荀丽丽:《再造“自然”:国家政权建设的环境视角》,《开放时代》2015 年第 6 期。

③ [德]约阿希姆·拉德卡著,王国豫、付天海译:《自然与权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35 页。